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

翁曾翰日记

翁曾翰著 张方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

翁曾翰日记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翁曾翰著
张方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翁曾翰日记 / (清) 翁曾翰著 ; 张方整理.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4.3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1辑)
ISBN 978-7-5506-1080-4

I. ①翁… II. ①翁… ②张… III. ①翁曾翰 (1837~1878) —日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8346号

书 名 翁曾翰日记
著 者 (清)翁曾翰著 张 方 整理
责 任 编 辑 王淳航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225008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77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080-4
定 价 5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4-85868858)

存史謐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題辭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
知音，千载其一乎！一入之心固佳，
知音之一今读新编，缔见史料，
利，真有治学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谨书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殚精竭慮旁搜遠詮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二〇一三年

王水照先生题辞

十三日晴入署被授詩書六件未刻教誦畢歸寄榮字

廿三號作附發人閩呈

十霄晴暖送吳清卿署使賀烟石檻殿小憲學伯半夏相就永勝

奉回不為虛聲之擣第知吾今日回堂源全主幫及郎率工行之

蒋子良繪陳曉庭痛跡

十五日晴午後抵品閱集卷因雨三冬守禁持子遠

出張海嶠房
張海嶠性嗜酒

臨諸數刻伊小士三十人酣三人也晚飯後更倚高窗望石竹柳暢快

亥初歸子初月食三刻食既坐正方懷元
中名伏處專研紅拂齋

昔夢臣風雲晴寒入署收糧是件快事一件半刻報至城廬之水道

步級差城缺補典故公沽酒食為餌以月三十六日解缺初缺並至

塞草三而散 素始占李長照津川兼均石五方事能起坐外監房

多所苦矣

早日新雪還至信考

廿二日晴東北空曠黃磧上聞初霜知四度寒冰筋骨相觸若燒未遠未勞
甚據立奇考一詩初探山桂枝荆防香有致在微移與壓輕櫻子中而

仰天和若金張貌具足了其補事亥初散正初告期殊遇狂狯手

世言晴松楊內為画者九月廿四日同南都郎第之沂大原已午即程

生如瓦張 送全進序

初晴天風雨為
秋以燭千秋大壯

同和陽對
秋嘗日

辛酉子和來

因日樹更談 拙墨附圖寄來

火西

月擇旦猶重客擇夕而過

嚴叔正月三十日
京寓单不李到西閣長卷并次山如圖寄

智者自居五石成篇處外桂迺同仁本果其贊育九

半
才初歸故

後故故家即起士周之括生有疾遂停庭竹作同是也

恩大云已為代室小

原仍就速性而院其價十五而其金多毫毫散落又色美福底立菊庄

泊坐有詩少孤苦未研些亥初歸 今日因君吉人喜食东酒

书影三

会演进汉文字中的墨迹，烟气麻染夏代更贴指指纹天令印文字中
至口人，而凤摹升文，若登，皆出于甲骨文而未具篆隶之形，殷呈并恐
望口通耳。秦鲁出金玉沃游为一好口走，留同个文，秦晋通不
矣。《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虽然，实非此是唯口齐新古皮飘武印文字中的小看墨口平于残墨损

，且待味念司帝存通人文武风止文国中谈音视

史，始创史说要章的封去合国中升当从者，左分取致干缺，过不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广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励,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由國公留而。國美丁去帶品階升為子爵。翁同龢之父譚其諱，美全牛滿衣階互稱。至孫，甲 0601。翁同龢文曾父生本其由限食器而立明諱于“日日服飾”。則 2013。其，翁同龢京北的相處了翁同龢

前 言

二

其諱。至本義育生因家國于蘇州，繼承家業嗣于“日日服飾”
——翁同龢。同治十二年正月，翁同龢

翁同龢(1837—1878)，字海珊，小名筹儿，江苏常熟人，晚清名臣翁同龢之侄，后来过继给翁同龢为子。他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咸丰六年(1856)与工部尚书松江人张祥河(诗舲)之女结婚。咸丰八年(1858)，戊午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同治元年(1862)，其祖父大学士翁心存去世，他被特旨恩赐为内阁中书，同治二年(1863)选补到阁，后历任委署侍读、玉牒馆校对、内閣典籍、内閣侍读等职。光绪三年(1877)，翁同龢本生父翁同爵病死湖北巡抚任所，他偕妻子回籍奔丧，并料理后事。次年五月在返京途中，在天津不幸感染伤寒，回京后四天就去世了，终年仅四十二岁，可谓英年早逝。他的去世对翁同龢的精神打击很大，翁同龢说：“呜呼肠断，何其酷耶！一缕未绝，百痛交并，距死如此耶！”^①反映了他内心是何等的痛苦。

翁同龢生前酷爱抄书、藏书，并写有日记，名“海珊日记”。光绪七年(1881)，翁同龢大儿子安孙病死常州，家族以翁同龢堂兄翁同源之孙景官(翁之廉)承嗣安孙。而翁之廉又无后，则以其弟翁之惠之子兴庆(翁万戈)承嗣。因此，包括“海珊日记”手稿在内的翁同龢、翁同龢所遗留之藏书均归翁万戈继承。上世纪 40 年代末，翁万戈赴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 年，1363 页。

美，将其嗣父翁之廉传给他的翁氏藏书精品带去了美国，而留在国内的部分则由其本生父翁之惠保存。1950年，翁之惠将这部分藏书全部捐给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共2413册，“海珊日记”手稿即在此列。^①

—

“海珊日记”手稿现存九册，均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现将其版式及每册起止时间，依次简介如下：

第一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九行，字不等。封面题“癸亥日记”，扉页题“程庭桂，刻资收到”。时间为同治二年（1863）正月至十二月。

第二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玉采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有“碧梧馆随笔，岁在甲子，海珊”。时间为同治三年（1864）正月至同治四年（1865）五月。

第三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丁卯日记，七月朔日始”。时间为同治六年（1867）七月至同治七年（1868）正月。

第四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己巳日记”。时间为同治八年（1869）六月至同治九年（1870）八月。

第五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壬申记事”。时间为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至九月。

第六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壬申冬记事”。时间为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至同治十二年（1873）闰

^① 详见赵万里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华书局，1959年。翁之惠所捐献翁氏藏书均缀以“翁捐”字样。

六月。

第七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癸酉秋日记，甲戌年附”。时间为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

第八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乙亥日记，光绪元年”。时间为光绪元年(1875)正月至光绪二年(1876)三月。

第九册，朱丝栏，白口，四周双边，上双鱼尾，“松竹斋”制笺，半页八行，字不等。封面题“丙子四月日记，丁丑年附”。时间为光绪二年(1876)四月至光绪三年(1877)二月。

三

翁曾翰久居京城，同治二年(1863)开始在内阁任职，于时清廷内忧外患，政治动荡不安。作为晚清动荡时局的亲历者，翁曾翰曾自叹道：“自问庸才，仰愧清德，外度时势，国报为难，中夜为之耿耿。”因此，其日记对晚清时事有一定记载，可作为研究之参考。如光绪三年发生在天津的士兵哗变事件。据《清实录》记载，光绪三年正月，御史王昕奏报朝廷，屯扎在天津的兵勇纷纷哗溃，有数营之多，一路抢掠，窜入山东省。于是，清廷令李鸿章查明事件。李鸿章报奏：“哥老会匪潜煽驻防天津营勇，哗扰溃逃，经总兵周盛传督队跟追，已将会匪溃勇尽数歼除。”清廷回复：“据奏中军前营、前军右营，勇丁各散去百余名，恐尚不止此数，该勇丁究竟窜往何处，著李鸿章派员迅速查明。”李鸿章又奏“查访明确并无窜往他省，自不必再加咨行”，从而了结此事。^①而翁曾翰对此事却有不同记载：“初三日天津有兵变之事，因索饷而起，职营官而哗溃，向西南而逸，一走正定，一走山东”；

^① 《清实录》第五二册，中华书局，1987年，646—647页。

“津勇之实由于统领扣饷刻待所致，本月初三日夜哗变者约二千余人，掠买卖街而逸，窜山东沾化、蒲台等处，以八卦旗为前导。”从日记来看，此事的性质和程度比李鸿章奏报的要严重得多。在处理此件事情上，李鸿章极有可能为了袒护自己的亲信部将周盛传，从而避重就轻，瞒报了此事的起因及严重性。还有同治九年（1870）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件。事件起因于谣传教堂拐卖儿童、剖心挖眼，从而导致群众焚烧教堂，并殴毙传教士十余名的惨剧。此事经曾国藩查实后，奏报朝廷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并与洋人订定了抵命人数。这使得曾国藩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声誉扫地，最终被调离京城，郁郁而终。翁曾翰记载了此事在群臣中论辩的情景：“今日未刻，曾相奏报，遵查津事大概情形，谓教堂并无迷拐实据，确系津人怀疑启衅，请明降谕旨宣示，并将天津府县革职，交刑部治罪。于是召见诸亲王、军机御前、弘德殿师傅，博询集议。醇、惇抗论，师傅亦有公论，而总理诸大臣持不得已之说，良久无定议，终从曾相之请。此诚夷务之一大关键，及今不能挽回，恐自强无日矣！”翁曾翰显然是反对这种处理结果，认为自强恐无日矣。但是清廷群臣在面对民族情绪与外部压力情况下也显得无奈与彷徨。

翁曾翰作为翁同龢的嗣子，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这位叔父。因此，他对翁同龢的日常生活记载尤详。《翁同龢日记》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业已出版多个版本，是研究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但是，翁曾翰从旁观者的角度对翁同龢的记述，还是具有一定价值。如日记记载：“英、法、日本六国皆于十七日过年，总督行文知照各部院堂处前往各外馆贺年，今日吏、户、礼三部堂处均往，叔父亦随众一行，殊快快也。”“殊快快也”是对翁同龢情绪的描写，反映了翁同龢对向外国公使贺年行为的排斥与厌恶之情。还如日记记载“叔父怒掷秀姑，伤额失血甚多，五哥驰视，余归不及往，为之悬悬”，翁同龢发怒而怒掷其妾，展现了一代帝师所不为人知的一面。

另外，翁曾翰与其本生父翁同爵感情极深。一次，其得知父亲生